

浙江能否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郎友兴

虽然率先实现治理现代化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具有全局性意义。浙江有条件与基础成为“率先”的第一方阵。而谋划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先行区，需要在核心理念和思维上作出定位，需要率先形成一个符合浙江省情、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这需站在高位以求进，攻坚克难，重点提供行政面、社会面、文化面、技术面、法制面的支持

不久前，浙江省作出了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那么，是否由此可以进一步提出并预见，较之于其他区域，浙江可以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何这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读者朋友也许猜对了，就是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所引发出来的议题。这次疫情防控，各区域、各地方的表现，成为检验与评估治理水平的一次好机会。疫情没有结束，当然，还不能作出结论。但是，各地在治理水平上的差异性得以充分呈现，尤其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社会自身发育的情况，各地的水平差异是明显可见的，同时也暴露了治理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短板。这些都将成为今后需要重点解决与建设的方向。

一个区域率先实现治理现代化是否可能？

某一（些）区域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先发为基础的区域治理目标，指的是在中国某些区域尤其东部地区在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先发”的前提条件下，在国家政制统一原则下，率先推进区域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论述的一个前提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在时间上有阶段性、在区域上有不平衡性，并且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率先实现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 2049 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一个区域如浙江是否有可能提前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由此率先全面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呢？这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可以从已往的经验、制度与政策空间两个方面加以说明。这就是说，以往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而这种可能性来自于制度与政策的空间。

从经验上来看，有不少地方、领域都提出过或者已经实现了某区域、某领域现代化。从区域上来看，2010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0 年长三角地区率先于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而处于长三角地区内的江苏省无锡市于 2013 年 7 月提出确保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区域现代化，成为全国现代化建设示范区；2030 年全面实现区域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江苏省在《江苏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判断与建议》提出，江苏将在 2016 年以省为单位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标准；根据江苏省定的全面小康社会标准测算，江苏将在 2018 年以省为单位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标准，这要比全国早两年实现全面小康。当然，同处长三角的浙江自然也不甘落后。进入本世纪后，浙江在第一时间提出加快发展步伐，争取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其目标是：到 2005 年，争取有近 1/3 的市县人均生产总值 3000 美元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到 2010 年，

全省人均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争取有近 2/3 的市县基本实现现代化；到 2020 年，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差不多同时的 2002 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广东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当然，以上诸个实例主要还是围绕经济发展指标、城市化等方面展开的。



从领域上看，早在 2015 年，农业部就提出了有条件地区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在教育领域，国家正在实施若干大学率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还有法治的率先现代化。这些都具有同样的治理逻辑。

在时间点与议题上，最接近本文主题的就是深圳了。2019 年 8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深圳要做到“五个率先”：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在“五个率先”的第二个“率先”中提出全面提升民主法治建设水平、优化政府管理和服

经验观察，例如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应对情况也表明，部分地区例如长

三角地区已出现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发展快一点、早一点、治理水平高一点的现象，不妨由此推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当然，以往的经验表明“率先”是需要制度的空间与政策的支持，需要制度或机制的基础。从制度与政策来说，地方有相当的自主空间。中国是个单一制的国家，但是地方有各自的自主权，就区域来说，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针对港澳台，宪法上有“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对基层有人民群众自治制度。即使地方政府，无论在财税、土地、教育，还是对外开放诸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自主空间。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和沿海的一些城市获得了特别的自主权，成为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也就是说，区域如省市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就在于地方依然是一个相对自足、有自治性的系统。

从学理上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度、多面向的体系，至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等领域。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②可是，现代化在领域上的实现有先后。从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来看，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是有先后的，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经济、城市、教育然后政治、社会、文化渐次实现，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也基本上经历大体相似的历程。即便在一个共同体内，现代化的实现在区域上也有先后。在中国，某些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在某些领域主要在经济方面可以或者说已经率先实现现代化了。那么，人们可以进而推理，某些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在某些领域如在治理层面也可以率先实现现代化。这种推理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符合经验的。

何以可能：浙江的优势^③

浙江优势之处在于城乡的活力，在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创新，在于社会自身的发育，在于政府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对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难发现，浙江具有一系列的优势。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这种优势在浙江体现得特别明显与充分。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的先发性优势，尤其民营经济得到快速的、有效的发展。1979—2017 年全省个私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 24.1%，比 GDP 年均增速高 7.4 个百分点，个私经济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5.7% 提高到 2017 年的 61.0%，已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力，推动了浙江经济持续发展。民营经济成为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2018 年浙江税收收入 73.3% 来自民营经济，比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浙江以全国 1.05359% 的国土面积和 5737 万的人口（2018 年的数据）和 5.6 万亿元的经济总量（2019 年的数据），成为中国最具创新力、活动力和成长性的区域之一，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障。事实上，浙江在基本现代化方面或者说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优势有双重意义。这种经济上的优势为浙江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层面的保障。但是，这不仅仅是物的层面，因为经济同政治、社会层面的因素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经济的现代化需要一个法治与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以及社会体系，反过来经济的发展促使政府、社会体系和法治走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这种优势同样在浙江体现得特别明显与充分。相比较全国其他区域，浙江区域内的差异较小而发展各有特色与优势，逐步打破城乡和地区分割局面，率先推动区域统筹发展，城乡、区域间平衡协调发展。2018 年浙江省的数据表明，浙江不愧为中国发展最均衡的省份。浙江之所以

被公认是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浙江城乡收入比 2.036，这一数据为全国各省区中最低。另一个就是 11 个地市间均衡发展。2017 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乡倍差降至 2.05，小于全国的 2.71，也小于上海、江苏、山东、北京和广东，11 市中最高市与最低市的倍差降至 1.70，是区域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浙江自古以来人文荟萃，教育发达。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浙江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激活并得到充分的展现。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的精神有契合关系，为率先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文化上的动力。这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浙江各级政府的治理水平得到社会的肯定，表明浙江有着相当丰富的治理人才和人力资源优势。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浙江是全国最具有制度创新性的区域之一，尤其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形成了高水准的服务化、精细化、人性化的治理机制，如武义的“村监会”、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桐乡的“三治合一”、宁波的“小微权力”、安吉的“两山”等不一而足，都已成为全国的模板，不少成为中央的政策或决策的依据。制度创新所带来了制度优势。这种制度创新优势表现在更能够吸引人才、投资，以及更多的劳动力的流入、国际性元素的引入。从人口增长的情况来看，2018 年末，浙江常住人口为 5737 万人，与 2017 年末常住人口 5657 万人相比，常住人口增量突破 80 万，增量较 2017 年末增加 13 万人。

浙江以效能建设为核心，积极探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从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开始，到建立行政（便民）服务中心、打造服务型政府，到最近汇总成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一步一步地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年来，浙江在治理上始终能够处于高水平运行与领先的位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处置再次展现了浙江的治理水平。

人们有理由相信，以上这些优势汇集起来，可以构成浙江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当然，要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存在着一些困难和约束因素，例如，老龄化的问题。2018 年浙江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1124.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6%，比上年上升 0.7 个百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780.2 万人，占比为 13.6%，比上年上升 0.6 个百分点。老龄化的快速增长趋势给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再例如，日益频繁流动性和社会结构越来越开放对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动态平衡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何“率先”：对策与建议

有关“率先”，浙江其实已经有所思考了。例如，浙江省曾提出高水平打造乡村治理现代化先行区的想法。2019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争当省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成为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这个决定可以视为一个“率先”的行动动员和部署。为此，中共宁波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推动宁波市域治理现代化走在全国全省前列”“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市域治理示范城市”。而 2019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湖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也提出，湖州要成为市域治理现代化先行地排头兵。2019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温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中共温州市委关于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也提出了温州要争当我国新时代市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

成为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示范城市。前列、示范也好，先行区、排头兵也好，其实都是“率先”的意思。

谋划率先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区，谋定而后动。如何谋？这就需要在核心理念和思维上作出定位，需要明确从何处着力，清楚其核心任务，需要梳理出重点环节。

（一）“三者统一”和“能动治理”：“率先”的核心理念和思维定位

谋划率先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先行区，需要在核心理念和思维上作出定位。“率先”需要确认价值性的东西。治理现代化要确立价值理念，而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治理所面对的本质性议题就是建立一个怎样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是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的人之为人的全部类本质和发展本质。^①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概念：“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也明确地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载体机制”，而这一点恐怕为不少人所忽视了。实现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利益、精神和发展三者统一的共同体。这就是浙江“率先”实现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应该确立并秉持的价值理念。它包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包含着利益共通共享的理念，包含着主体意识与归属意识相洽，包含着多元价值共存、融贯和整合，包含着信任与合作、宽容而进取，平等、公益性的精神。

而思维的定位，就是要需要树立能动治理的思维，以能动主义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率先实现。能动治理就是在尊重治理规律前提之下，积极主动探索治理机制、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率先工作的推进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包括市场经济中的工商阶层、政治力量中的执政党与各级政府、社会组织、职业的专业人士的推动力，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各推动力之间如何形成合力？这才是推进率先实现治理现代化工作的关键。能动治理的工作思维定位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主观能动性”。有“主观能动性”才能使“率先”成为可能。

（二）何处着力“率先”？中国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点是什么？

省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省域层面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落实，是一个立足省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治理实践。浙江在什么方面可做到率先？实现率先的关键是什么？笔者以为这个“牛鼻子”就是省域治理的制度体系。浙江要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就是要率先形成一个符合浙江省情、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省域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着眼全局，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设计。浙江正处于全面发展的关键期，需要继续发扬优势、补足短板、加强弱项，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全区域的治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在省域治理上积累形成一整套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有效能的坚实保障”，并且提出了重点健全“六大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现代法治体系、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保障体系。

我们讨论区域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包含着空间和场域治理问题。这里的空间当然是指浙江。就构成来说，包含着社会治理等多维度的内容。要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核心在于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社会治理恐怕是治理现代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域，也成为中国各级政府越来越需要担当的职能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中，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也明确地指出了“社会治理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是省域治理的重大任务”。



（三）推进的重点：五个面向的支持

治理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在立足省情的前提条件下，需要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走在前列。谋划率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浙江来言，需要立足浙江实际，站在高位以求进，抓住重点攻坚克难。具体说来，重点在于提供五个面向的支持。

第一，行政面的支持。以市、县（区）的行政为主体，结合各市县的实际情况，构建一个纵横合理的治理体系，重点推进城乡共治的格局，为率先实现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行政面的支持。

省域之下存在着市、县（区）、乡（镇）、村四级治理中心。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县（区）主阵地作用。尽管“郡县治，则天下安”是个旧命题，但是依然是现实。当然，县治在新时代有新的任务，也面临着新挑战。事实上，市、县域尤其市（地级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从行政层级来说，中央和省级机构是政策的制定者，区县层面的角色最主要的就是具体的执行者，而市级层面则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位置，它不仅是其上级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一个政策制定者。由此，不难理解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等地纷纷提出了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和上级的任务要求，又要立足实际对本市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⑤ 为此，需要进一步理顺市、

县、乡镇的权责关系，构建形成“市级统筹、县级推进、乡镇强基固本的治理链条”，为浙江率先实现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行政力。

这里尤其要将重心放在基层治理体系的框架上，完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治理机制，实现城乡共治。《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制度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并且提出了全面建设“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的浙江特色基层治理体系。”为此，要在现有基础上，做强乡镇（街道）治理单元，做专治理单元中的社会组织，做细和做活治理的细胞（城乡社区的网格）。

第二，社会面的支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实现共治与自治相结合，为率先实现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社会面的支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概念，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社会是由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体所构成的，就社会治理来说，有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等治理主体。社会治理需要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参与，需要各主体之间通过民主协商、通力合作以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更何况，现在进入到一个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的风险社会，风险防范与治理不是单一主体或系统可以担当的，也不是由一个超越这个复杂系统之外的某一主体来统领就可以解决的，是全社会的事。当然，各主体其地位、重要性各不同，角色各有侧重与担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之所以一再强调共建共治共享，道理就在于治理的公共性特质。强调“全民共建共享”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推进政府治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三者紧密结合，旨在给社会松绑，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实现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社会力。浙江具有治理所需要的良好社会基础与力量。《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载体机制”：创新组织发动群众工作机制，完善党建带群建工作制度，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和动态赋权机制，增强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健全志愿服务激励保障机制，等等。尤其需要传统德治的创新性转换，创新德治载体，发挥德治的教化作用；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作用，激活基层自治体的自治机制，发挥自治调节作用。

第三，文化面的支持。治理现代化需要文化内涵，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支撑。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发掘浙江传统文化资源，增强治理软实力，为率先实现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面的支持。

浙江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乡土文化、文明乡风、弘扬乡贤文化、德治等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and 基础。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水平的提升、文化新内涵的拓展、科学文明的现代文化的洗礼与浸润，就成为必需。同其他区域相比较来说，浙江自古人文荟萃，人杰地灵，但是同未来的无论发展还是治理的要求来说，浙江在教育文化素质高的人口结构上比例依然不高，尤其创新性的人口结构不高。可是，人为地有意识地减少从事低端产业的劳动力人口，一时也做不到，也缺乏道义，而且只是一味地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也不见得可持续和有效，要知道其他地方同样可以采用甚至超过浙江的优惠政策。浙江应该以共享、共治、共存、合作、宽容、进取的理念，建立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共同体。高等院校的高质量发展、文化设施的新增与投入使用、职业教育的培训、文化活动和交流的推进，都为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软实力之必需。浙江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自身的区域文化的特性和优势，寻求有效推进治理现代化的的文化要素或基础。相信有了文化软实力对治理现代化强有力的保障和推动，浙江可以由此焕然一新。为此，《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完善思想文化引领机制，加强与完善党的宣传、意识形态工作，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健全思想政治

工作机制，强化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机制，等等。

第四，技术面的支持。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的日益密集，高速而大规模的流动日趋频繁，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的裂变，风险社会的迫近，都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挑战，当然也包含着新的契机。可以说，要率先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浙江已经处于一个具有高度风险性的时期了。例如，要进行人口尤其年龄结构等结构性因素，和与此密切关联的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与不断的变化，进行科学的模拟与预测，便于精准地进行有效的治理。因此，需要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浙江未来治理的问题与需求进行模拟与预测，为率先实现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技术面的支持，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和紧迫。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决策中，“大数据”成为常用词汇，事实上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大数据及其相关联的技术成为治理尤其公共危机治理的一个利器。正如国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所指出的：“大数据应用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为政府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预防准备、预测预警、决策响应和救援恢复等都需要数据的支撑。此外，大数据思维与大数据技术，给国家治理不仅仅带来了新知识、新技术，还有新思维、新价值、新理念。大数据和相关的处理技术，使真正形成多元主体参与需要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成为可能。

浙江省与阿里巴巴的平台化、数据化技术结合共创了一个数据化运营的政府平台模式，实现政府服务、政府治理进入在线化、数据化、平台化的新阶段、新形态。《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加快数字浙江建设，提升治理效能”。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瞭望》杂志撰文指出“，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牵引数字化变革，大力集聚数字化人才，加快经济数字化转型、社会数字化转型、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浙江”，为此要重点打开“两个通道”：一个是用数字化手段，打开点线面相结合、防控管打相贯通的治理通道；二是用数字化平台，加强综合集成创新，打开线上线下一融合、上下各级相联动的政务服务通道。^⑤

当然也必须清楚，不少问题仍需尽快解决。例如，一是建立数据治理的未来观。数字治理应该面向未来，以未来导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是要认识到现在及未来决策数据源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元和复杂；三是平台整合和数据共享进程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信息处理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等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将这个短板显露出来了。

第五，法制面的支持。法治是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必由之路。《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已经明确地要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高水平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强化数字化对法治现代化的支撑，形成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现代法治体系”。这个面向，毋须多言。

结语

虽然率先实现治理现代化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具有全局性意义。可以相信，这种率先完全可能成为中国最终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浙江有条件与基础成为“率先”的第一方阵。当然，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根本点在于其初始的动力、条件和路径，并不是最终成果或结果。千舟竞发，船本身动力不同，船长、水手经验相异，各自起航，自然有先有后，但是最终都可共同实现目标。

①《人民日报》，2019年8月19日，第01版。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① 这部分下面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浙江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① 陈一新“，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人民日报》，2018年07月17日 07版。

① 车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瞭望》2019年第12期，第9页。